

事件、话语与艺术^{*}

——重审利奥塔、利科之争

刘欣

提要: 利奥塔与利科各自启用“事件”概念思考话语和艺术问题。如果说利奥塔在语言游戏、短语连接以及现实历史事件的扭结处发现的“异识”是哲学的终极任务,利科则在事件带来的“分歧”中看到政治步入良性循环的可能;利奥塔“事件”的颠覆性让我们获得新的短语连接方式,利科则坚持在注视异事件的深渊后,面向未来的我们需要有限度地走向“自由”的价值;利奥塔以“后现代艺术”为赌注开启了激进的“非人”未来,利科则将艺术视为亟待解释的事件,它奠定人类共同生活的根基。重审利奥塔、利科之争,旨在理解他们各自的观点和差异,获得继续事件之思的契机。

关键词: 利奥塔; 利科; 事件; 异识; 独异性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21.04.021

在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后现代”哲学话语中,事件(événement)概念尤为重要。^①从《现象学》(1954)开始,利奥塔在著述中频繁启用“事件”思想,用“异识”(différend)^②对抗总体化的结构与宏大叙事,并尝试在“后现代”语境中赋予艺术事件的品格。与他相对,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作为后结构主义暧昧的对话者,同样以事件作为反思性解释学和诗学的关键概念。在事件哲学中,他们各自确立的事件理论有效地反抗了结构主义封闭的事件观,但在“事件”的能指背后,利奥塔与利科在哲学—诗学中的深刻差异,还有待细致分辨。

一、利奥塔的“异识”事件

早在利奥塔的博士论文《话语·图形》(1968)中,利科已成为反思的对象。利奥塔认为在利科的现象学—解释学中,“文本”仍是在封闭性的系统中被赋予所有“意义”(le sens),于是“自我”对文本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保罗·利科诗学的‘事件’概念研究”(19FZWB068)阶段性成果。

① 在《利奥塔词典》的“事件”词条中,Anthony Gritten指出虽然利奥塔没有像鲍德里亚或德波那样,形成关于事件的明确理论,但在他论崇高、当代艺术、技术科学、精神分析、语言等主题的作品中,围绕事件概念的积极探索,深刻地推进了事件理论。见Stuart Sim, ed., *The Lyotard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1.

② 汉语学界已有“歧见”“异识”“纷争”“歧争”等多种译法,本文采用的“异识”可与哈贝马斯等哲学家的“共识”论相区别。参见周慧《利奥塔的“异识”论》,《哲学研究》2015年第8期。

的无限解释或文本向我们的开放确保了意义的获得,承认文本、语言、象征的符号是“产生思想”^①的意义之源,解释学于是满足于使意识通往交流、理解和倾听的道路。但文本话语中意义的绝对超量(l'excès)及其解释活动的必要有限性(la finitude)被忽视了,“话语的蛮横继续存在”^②。在为利奥塔带来国际性声誉的《后现代状况》(1979)中,对思辨叙事、元叙事的批判顺带将解释学话语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作为知识的合法化叙事之一,解释学话语被视为思辨语言自我确证的游戏。“当代的解释学话语正源自这种预设,它担保存在着需要被认知的意义,于是它就使历史(特别是知识的历史)具有了合法性。”^③解释学话语作为寻求共识(consensus)、寻找更优解释的语义活动,在利奥塔看来扮演着在真理退场后的合法解释者,自我合法化为一种大学知识话语。在“解释学话语”这个短语的注释中,利奥塔略显突兀地将其直接对应到当代解释学代表作——利科的《解释的冲突——解释学论文集》(1969)和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第二版,1965),并未给出任何引述或说明。在利奥塔看来,利科以语义迂回为中介的反思解释学,伽达默尔将理解看作此在存在方式的哲学解释学,两者作为当代解释学的“权威”都以同一化的合法化叙事,使自身成为规范性的大学知识话语。

通过解释活动达成共识,这在利奥塔看来并不是哲学的内在追求。从《后现代状况》到《异识》(1983),共识的标准(critère d'accord)遭遇根本性的质疑,利奥塔挑明不可能有共识,人们做出判断但不使用任何共同标准。在《异识》中,异识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话语——实践悖论:在任何争论双方所进行的语言游戏中,实际发生的是一种陈述、连接短语(phrase)的活动,短语有发言者(addressor)、接受者(addressee)、指涉物(referent)和意义(sense)四个要素,四要素之间不同的关系模式形成不同的话语体制(phrase regimens),如指示、指令、显示、请求、描述、论述、命令等等;此外还存在着不同的话语类型(政治的、伦理的、法律的、文学的等等)组织短语体制之间的关系,并对连接短语的独特方式存有相应的评价标准,这样每个话语类型都禁止某类型的连接,如在科学话语中,我们无法将“地球土地面积约1.49亿平方千米”与“大地女神叫盖亚”这样的短语连接起来,强行连接的后果是被排除出科学话语。当一个短语,即一个语言游戏将自身的规则和价值强加在另一种语言游戏之上,并阻止对方保持自身的言说方式时,异识发生。当短语之间的连接发生“错误”和阻塞时,异识将在进行短语连接活动的主体置于不安甚至危险的境地,因为我们通过必要的判断进行的连接总是排斥所有其他的短语,特定的话语类型只允许使用自己的短语,而任何连接都是在用一个短语回应上一个短语,用一种选择终结无限多的连接方式,压抑不同的声音涌现的可能性。所以短语和异识问题最终归结为事关现实世界的政治问题,异识就是处于争执中的短语“与争论不同,异识是两方(至少)之冲突,且因缺少普遍使用的话语判断标准,公正地化解冲突绝无可能。”^④异识在利奥塔看来可能是一种糟糕的语言与现实状况,但它的发生却肯定并加强了话语之间不可化约的异质性,同时为新的短语连接和公正提供了可能。于是对异识的发现、见证和言说成为知识人的当代任务。

利奥塔而异识事件是对任何宏大叙事的拒绝,它们强大的颠覆性,让我们获得新的短语连接方式,学会拒绝惯例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在《普遍历史与文化差异》(1984)一文中,利奥塔谈到的是1911年、1929年的经济危机对经济自由主义教条的拒绝,1968年“五月风暴”对代议制民主及自由主义教条的拒绝。正是由于我们与这些事件的遭遇,才能在事件中亲眼见证此类宏大叙事的坍塌,开始重新思考和选择,这让利奥塔所谓的后现代性成为可能:不论我们选择忠实于事件的拒绝、顺从亦或

① Paul Ricoeur, *Philosophie de la Volonté II: Finitude et Culpabilité II: La Symbolique du mal*, Paris: Aubier, 1960, p. 323.

② Jean-François Lyotard, *Discours, Figure*, Paris: Klincksieck, 1971, p. 12.

③ Jean-François Lyotard,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Rapport sur le Savoir*, Paris: Minuit, 1979, p. 59.

④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Differend: Phrases in Dispute*, trans., Georges Van Den Abeel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xi.

沉默,我们至少已经可以重新判断。宏大叙事建构的是迈向自由的进步主义历史观,不论是通过自由贸易竞争和民主代议制,还是通过将自我献祭于集权体制,历史在这些叙事的承诺中终将抵达名为“自由”的终点。可以说,利奥塔的“事件”本身就是对这些虚假承诺的深刻质疑,返回并不断思考事件,去见证事件的发生带来的全部可能性,发现被我们的判断所压抑的空白、断裂和沉默。

事件是知识的深渊,“这些深渊或其他的深渊,每一道深渊都希望它们的独异性得到精确探索。事实上,它们都解放判断。如果它们可以被感受到,判断就必须发生,而且不固守唯一的标准。”^①事件在撕裂宏大叙事的同时,给历史带来全新的东西,这里利奥塔对事件独异性的强调让他与利科走到达成“共识”的边界。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如何应对事件对思想的挑战,如何在深渊中继续行进,认识事件的独异性后又意味着迎向怎样的历史观念,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利科与利奥塔的差异是根本性的。

二、利科的回应:事件与分歧

利科不仅大段谈论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指出后者敏锐地洞察到话语之间的不可调和,同时也回应了利奥塔对解释学的上述质疑。利奥塔宣称在差异和非同一的“小叙事”中,无法克服的分歧将构成一种正义实践,以去合法化(délégitimation)话语取代合法化话语的浮夸修辞。但在利科看来,共识的可能性是一切哲学的基础,“但如果共识的标准本身就有争议,那我们如何才能解决一场争论,就象这里挑起的与哈贝马斯之争?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规避了初始问题,即对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描绘的可能性后,我们甚至无法开始一场论争。”^②所以即使是利奥塔提出的“后现代”概念本身就面临着自我瓦解的矛盾,“后现代”的自我指称,对“我们的”这一主体的吁求,显然也具有一种强烈的修辞意味,也必将遭遇利科所谓的“述行矛盾”(contradiction performative)。类似于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历史解释学,纯粹“历史化”的观念认定一切共识只是徒劳,永恒的“异识”是绝对的,而在这样的持续纷争中,任何一方都可以用意识形态的名义,将对方的解释斥为“立场”使然,这在利科看来只能造成对任何解释的“无力的怀疑”。他进而指出,“是否认为一切论断都具有相对性的论点本身会在自我指涉中自行摧毁,问题随之而来。”^③也就是说,“异识”无力进行任何论争,因为它仍在用多元解释的方式制造“异识”。提出“异识”就已将自身置于诸多解释之中,而利奥塔似乎认为“异识”作为真实的状态,与其他合法化话语没有任何关联,这就是陈述本身的“述行矛盾”。

争论并不一定会引发交流和理解,解释的冲突更不会走向共识。针对利奥塔的决绝姿态,利科首先将《异识》中的短语、话语类型分析解释学化,他指出利奥塔在提出、解释“话语类型”时所遵循的话语制度就是“争论”,不论态度是否强硬,争论意味着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利科认为与利奥塔反对的争论类似的概念是分歧(dissensus),他接下来通过对法官和历史学家之间话语分歧的讨论,同样强硬地捍卫了共识的可能性。以奥西尔的《大众暴行、集体记忆和法律》(1997)为例,利科开始审视20世纪后半叶国际大审判中分歧的发生及其意义。奥西尔关注的是在审判、辩护、解释和判决的复杂过程中,产生分歧的必然性及其政治伦理意义。漫长的公开诉讼中法官与律师之间,法官与历史学家之间,以至于他们各自内部之间都在用“分歧”进行对话,而正是这些被公开的分歧,避免了无尽的怀疑主义,让审判成为对自由主义价值的伦理至上性的见证。就此而论,那些为无耻罪行进行的辩护,仍是以其自身的自由言论确证了审判的无上尊严。审判于是被利科视为对不可见之事的公开重演,它通过公共讨论让分歧的发生过程进入一般公民的视野,在舆论和集体记忆的层面分歧具有严肃的教

^①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Lyotard Reader*, Andrew Benjamin, ed., Oxford: Blackwell, 1989, p. 404.

^{②③} Paul Ricoeur, *La Mémoire, L' Histoire, L' Oubli*, Paris: Seuil, 2000, pp. 412, 399.

育功能“进入公共领域的史学家之争已成为生成民主之分歧的一环。惩戒的独异性(singularité exemplaire)只能由一种开明的舆论来塑形,这种舆论将对罪行的回顾性裁决转化为阻止其再现的承诺。通过被放回承诺范畴之中,对于罪恶的沉思可以离开无尽的哀悼和感人的忧郁,更重要的是,摆脱归罪(inculpation)一脱罪(disculpation)的恶性循环。”^①分歧最终指向“负责的公民”接受历史记忆的方式问题,与以审判的权威强制达成社会共识不同,让公民看见分歧,理解分歧并加入其中,学会在面对作为独异事件的罪行时,从分歧、判断走向承诺,即对不可让事件再次发生的确信。

如果说利奥塔的异识描述的是后现代社会的一般状况,他在语言游戏、短语连接以及现实的政治历史事件的扭结处发现的是哲学的终极任务,利科则在事件带来的分歧中发现了政治步入良性循环的可能,在历史解释和法官的判决之外,还存在作为第三方的公民,最终是公民经过“分歧”产生的“确信”验证了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性以及历史学家使用档案材料的忠实性。利科的“公民”是民主宪政、“自由主义”价值的守护者,他是事件最终的仲裁者,而这在利奥塔看来无疑又是在用一种“指示”或“命令”的话语体制,暴力地将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一种话语类型)合法化。这里利科的分歧似乎存在成为程序正义的危险,它只是最终达成单一的确信和共识的工具,而事件本身常常走向分歧—共识式良性循环的反面;利奥塔的异识则规避了建立在特定政治立场上的实际治理,却在哲学家与异识的危险嬉戏中被自己发明的话语体制和类型捕获。

与之相对,利科将事件还原为证实“自由主义”价值的历史证据,显然他无法像利奥塔一样,将“自由主义”视为一种宏大的进步主义叙事。在晚期著作《记忆、历史、遗忘》(2000)中,利科赞许地提及克利(Paul Klee)的画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著名阐释。《历史哲学论纲》(1940)将画作中的新天使命名为历史天使,他被天堂吹来的名为“进步”的风暴打入未来,终究无力修补作为“一连串事件”组成的“单一的灾难”的历史本身,只能任由尸骸和断壁累积如山。利科指出让天使无能为力的风暴实际上就是由人创造的历史,不是历史学家而是那些对事件作出回应的公民奠定了历史的“意义”。历史天使的愿望是“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②,而能实现这个愿望的只能是用记忆见证事件,同时创造历史的人们。当记忆触及“死亡面具之下,那些从前存在过的,行动并受苦的人们,那些仍守着未完成约定之人的面庞”^③时,我们才能说破碎世界的历史没有被遗忘,只有沉默的事件被回想起来时,彻底的革命或救赎才能发生。这里我们已经无法将利科所谓的“自由主义”价值与某种单一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同起来,如果在注视事件的深渊后,我们仍有共同面向未来的勇气,那么用叙述和行动背负伦理责任的人,就是有限度地使用“自由”、追求“自由”的人。在绝对的差异中,他们的“共识”在于对事件概念的重塑:一个事件(政治的、伦理的、艺术的)能够颠覆一个人甚至世界,这如何可能?利科与利奥塔给出了各自的解答。

三、事件的独异性

在利科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过于轻易地将历史现象的特殊性归之于技术的现代性,这样就有可能将奥斯维辛(Auschwitz)与古拉格(Gulag)等同起来,将其化约为现代性的技术后果。代价则是抹去了奥斯维辛或古拉格的独异性,也就是说在无形中否定了每个事件的独一无二(unicité)和无从比较(incomparabilité)。在此利科谈到了事件的独异性(singularité),能称之为事件的总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当场发生,是在历史的具体时空中只发生一次之事,两个事件即使表面相似,但也不可能相互等同,

^{①③} Paul Ricoeur, *La Mémoire, L' Histoire, L' Oubli*, pp. 436-649.

^② 本雅明《启迪》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70页。

事件及其叙述都是如此“所有如按历史计划打造般的单纯发生的事件,所有在时空中无法被重复的事后叙述,所有库尔诺(Cournot)意义上的偶然因果序列,都是独异的。”^①库尔诺的数理统计学所极力排除的偶然因素在利科看来构成了一种无法化约的独异事件,不可重复的事件让对于它的演绎(法庭审判)和叙述(历史的与文学的)具有深刻的伦理意味,独异性在此不仅意味着事件本身的特征,它同时指向我们作为见证者的独异体验,利科称之为事件的道德独异性(singularité morale)。奥斯维辛事件的道德独异性就在于它的不可比较与不可重复,正因为每一个罪行都需要被个别对待,理解其差异才能让道德判断对于每个人而言是独特的内在经验“道德独异性意味着骤然来袭之恐惧的绝对的无从比较性。”^②在此基础上,我们针对事件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或者陷入绝望和忧郁的深渊,或者将之转化为一种继续生活的勇气和责任,去追问为了让此类事件永不再发生,我们能够和应该做些什么。

对利奥塔而言,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中提及的“淳朴经验”构成了理解事件的关键“一个事件,一个发生事件,海德格尔的 ein Ereignis 总是极致地单纯,然而这种单纯只能在匮乏(dénuement)中被切近。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想必须解除武装。’”^③为了理解一个历史的、政治的或艺术的事件,我们总是将其纳入惯例中加以解释,但利奥塔的“事件”并无建构意义的野心,它是某种尚未确定的事物,出现于一切解释和意义的活动之前。当我们遭遇意外事件时常常追问“发生了什么”,但这在利奥塔看来并不是重点,事件关乎的不是发生的事情(内容),也不是它意味着的事情(意义),关键在于事件的发生本身:

发生(qu'il arrive)总是“先于”发生了什么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提问先于问题本身。

因为“它发生了”是关于事件的问题,然后,它才涉及刚发生的事件。作为问号的事件“先于”作为疑问的事件到来。发生(il arrive),更准确地说“首先”是“发生了吗”(arrive-t-il)、“这是?”(est-ce)、“这可能吗?”(est-il possible)。“然后”才由疑问确定:此事或彼事发生了吗?是此事或彼事吗?此事或彼事可能吗?^④

面对意外事件,思想要学会迎接还没有准备被思考的东西。事件在此成为对“正常”意识的震惊和颠覆,后者无力思考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发生。此处利奥塔的“事件”抗拒了提供“意义”的救赎任务,与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渐行渐远。我们记得在《关于技术的追问》中海德格尔宣称现代技术用计算的方式控制人与世界,这种物化、量化的思维方式或世界观即所谓的“集置”(Gestell),他虽然没有直接批判技术,但他怀旧式的语调和焦虑让价值的衰落成为现代人的命运。与之相对,作为真理性事件的诗歌成为人恢复与存在间深刻联系的希望。他承认用艺术让我们免受集置摧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世界本身的贫瘠和机械化将持续下去,但他显然已将艺术视为人获取意义、恢复价值的关键。事件对利奥塔而言,并非意义的救赎者“它是消除意识之物,是废黜意识之物,是意识无法规定之物,更是意识在建构自身之际遗忘之物。我们无从规定者正是某事发生本身。或者更简单明了地说,它就是发生(qu'il arrive)。”^⑤事件于是成为对时间之绵延的一种即时干扰,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现在”或“当下瞬间”(instant présent)的发生。

对于利奥塔而言,与颠覆既定话语类型的奥斯维辛或“五月风暴”类似,艺术同样可以干扰既定的话语类型,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观看方式,从而获得独异性事件的品格。艺术甚至在利奥塔看来构成了思考异识,对抗“共识”的主要模式。这样的艺术事件必须同样给历史带来新的东西,自我立法的“后现代艺术”就是以颠覆艺术惯例的方式,产生新的短语连接,创造新的思考政治与知识的方式,将

^{①②} Paul Ricoeur, *La Mémoire, L' Histoire, L' Oubli*, pp. 432-435.

^{③④⑤} Jean-François Lyotard, *L' inhumain: Causeries sur le temps*, Paris: Galilée, 1988, pp. 102, 102, 102.

被做出的选择所撤销的事物呈现出来。之所以如此重视后现代艺术,是因为他在艺术的实验形式中看到了重写话语的自由“艺术家和作家在无规则中工作,在将被创造出的作品中建立规则。这就是作品和文本呈现事件之性质的原因。”^①艺术是用独有的方式呈现不可呈现之物,言说语言本身的沉默,以将自身化为异识的方式呼唤对异识的见证。

四、成为事件的艺术

利奥塔在论及马拉美(Mallarmé)的《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1897)、杜尚(Marcel Duchamp)的现成品艺术、纽曼(Arnold Newman)的大幅单色画、奥威尔(Orwell)的《1984》等作品时,关注的正是这些艺术如何展现某个重要“事件”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境。当我们的目光接触到这些艺术作品时,立即察觉到由经验积累而成的感知方式、理解方式无力应对全新的艺术事件,我们试图用意识捕捉它却反而被它捕获,意识到超乎预料之事正在发生的感觉中断我们连贯的存在感,主体意识与现实之间产生断裂,甚至将波及我们作为人类的身份认同。利奥塔的“后现代艺术”是在事件发生的瞬间见证事件之发生的“事件”,它让我们看到何为“非人”(inhumain)。在《力比多经济》(1974)、《后现代状态》等著作中,利奥塔在批判资本主义等宏大叙事对人的技术处置时,认为人已被资本掌控下的技术转化为非人之物。而在《非人:漫谈时间》(1988)中,利奥塔所谓的“非人”已不具有残酷的恶意,他开始思考两种不同的非人,他们都构成了对人文主义话语类型的冲击“第一个层面,人文主义意义上的人类是否在被迫变成非人?第二个层面,人所‘固有’者是否就是栖于其身的非人?”^②他坚持必须区分这两种非人,必须将以进步、发展为名被不断加剧的非人,与内在于我们自身的隐秘的非人区别开来。后现代艺术在利奥塔看来正是让我们感受到这非人的事件,它让人意识到人类自身的非人性,彻底摆脱人文主义叙事的束缚,看到我们作为一种语言动物的怪异性。艺术独具的这种令人眩晕、不安、着迷,陷入激进思考的能力,让其成为对非人的见证,也就是说艺术成为迫使人思考的事件。这就是后现代艺术让“人”处境尴尬的原因,它的不确定性动摇了艺术作为人类创造物的根基,“艺术必须分享、交流”、“艺术必须生产意义”、“艺术必须是人道的”等话语体制遭遇深刻质疑。与此同时,“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权威也在艺术的非人“崇高”前面临追问和侵蚀。利奥塔的反人文主义试图唤醒我们自身潜在的非人,如在我们成“人”之前“未被训练”的“儿童”,正是内在于每个个体的非人存在;此后在《后现代道德》(1993)中利奥塔抵达了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类”视角,艺术事件对非人的见证意味着交流、沟通和共识的不可能性,它并不是人类汲取意义的开放源泉。

艺术在告别生产意义、促进交流的任务后,转向的是一种新的“自律”,即让艺术本身成为见证存在的事件。在利奥塔看来,纽曼的画作已经不再宣示、再现些什么,他的画作、创造直接成为宣示。如果说《太一 I》(1948)、《太一 II》(1949)、《崇高而英勇的人》(1950-1951)等作品存在“主题”,这个主题只能是艺术创造本身,甚至是呈现世界和人类历史从最初的本源中涌流而出的“创造”,一个作为一切之开端的发生事件,它不可预料,如同“神”或艺术家的创造本身:“对纽曼而言,创造不是某人展开的行动;它是在无定之间发生的某事。所以,如果有任何‘主题’的话,那就是‘现时’。它发生于此时此地。发生之事(ce qui arrive, quid)随后到来。开端是有(il y a)……(quod);世界是有某事(ce

^①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Explained: Correspondence 1982-1985*, trans., Don Barry etc.,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 15.

^② Jean-François Lyotard, *L'inhumain: Causeries sur le temps*, p. 10.

qu'il y a)。”^①纽曼的颠覆性就在于他正在画存在显露自身的瞬间,在历史的混沌中找回先于存在者的存在,即“有某种东西”之前的“有”(il y a)本身,在il y a的事件之后,才次生出意义、个人或总体的问题。在意义被抛弃后,后现代艺术家的创造应转向对il y a的见证,对存在秩序的回应。利奥塔认为纽曼使用匀称的色调甚至晚期只用原色的做法(《谁怕红黄蓝?》)就是最好的例证,《这里》(I - III)(1963 - 1966)中的拉链被笔直的杠子划掉,《断碑》(1967)垂直的姿态在利奥塔看来不仅有昂扬感,也在对立、坠落和摧毁,在事件的发生之中,微弱的意义被建立又被终结,接着又会有不确定的事件发生。作为事件的艺术不需要被解释,甚至不需要“创新”,激进的后现代艺术只有一个永不过时的任务“画出有不可决定之物存在这件事情,即有(il y a)本身。”^②能见证存在的艺术事件同时构成了艺术的真理事件,它必然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揭示“现在”这个瞬间的真实状态,这就是后现代艺术扎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仍然保存激进潜能的理由。对存在的见证就是对现实的回应,因为它仍在召唤新的事件的降临。所以利奥塔坚持艺术必然是对犬儒主义的反抗,犬儒式的“不再有任何事件发生”的绝望终将被不可预料的事件驱散。在对《1984》的解读中,利奥塔再度确证了艺术创造的事件潜能。温斯顿(Winston Smith)用写日记的书写活动进行反抗,日记中他的生命事件得到保存,而体制则千方百计让意外事件得到全面掌控,日记的语言在官僚系统的语言之外创造了连接短语的全新方式。这里利奥塔看到的是艺术的创造让事件撼人心魄的力量得到保存,艺术的见证让事件回归自身的原初场景,在宏大叙事对它进行分析、解释之外,艺术以不解释事件的方式让事件自己发生,它以此见证那些最重要的“非人”之物“偶遇的幼年,抵达对正在发生的奇迹(某事)的热望,对事件的尊重。不要忘记你曾是、现在正是的这个你:备受欢迎的奇迹,得到尊重的事件,与你父母相伴的幼年。”^③作为对存在事件或“有”的呼应,艺术是以见证异识,制造“非人”之崇高的方式创造全新的事件。

在成为事件的艺术中,利奥塔拒绝了可交流性、可解释性,他以“后现代艺术”为赌注开启了激进的“非人”未来,舍弃的是艺术作为共识之中介的可能性,这与利科的“事件解释学”(l'herméneutique de l'événement)进路判然有别。在利科看来,文本是在与读者的对话交流中保存了意义的开放性,人类行为则在书写的话语中成为可以让“读者”理解的东西。叙述以其对事件的铭刻最终让个体得以在书写形式的中介下超出自我经验的限制,抽身反观事件的意义。事件无论属于哪个时间维度,都以新的形式被重塑。“叙述”以“物”的形式重塑了事件,让事件在文学、文本、作品中对象化,成为人类回忆自身行为事件的源泉,它让一种具有实践性的反思成为可能:叙述不仅能创造性地表现事件的真实,更能与事件拉开一段距离,它使人类在文学、历史叙述中得以反思自身行为的意义,而它本身也构成了触发、引导人类实践的“事件”。

从利科对艺术事件的解释中,我们看到的是他对历史解释者责任的强烈诉求。艺术事件作为历史总体的子集,解释者通过对它的解释最终达到的是在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交叉地带。在《历史学与修辞学》(1994)一文中,利科指出被书写的历史虽然属于叙述性话语,但并非只是叙述或虚构,他明确反对的是将历史解释学等同于文学理论或批评的处理方式。^④对事件的解释与叙述不可分离,但它同时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其中客观性永不会完整,主观性则是一种具有批判眼光的主观性,它应当通过划分出好的主观性,即‘探求中的自我’,以及坏的主观性,即‘哀怨动人的自我’,抛弃一部分自身的因素。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利科在这一领域的所有努力都是在证明探求真理的道路必然充满

①② Jean-François Lyotard, *L'inhumain: Causeries sur le temps*, pp. 93, 118.

③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Explained: Correspondence 1982 - 1985*, trans., Don Barry etc., p. 97.

④ 保罗·利科《历史学和修辞学》元熙译,《第欧根尼》1996年第1期。

弯路。”^①这种解释的探究活动在利科看来具有真理性,历史解释者的工作就是以对事件的解释探究人性,他们不仅是在事后弄清事件发生的痕迹,更重要的是弄清楚事件发生的基本意向,是对价值的唤醒“他所要解释的是人,是他在人类文明中发现或界定的人和价值。”^②但问题在于,解释活动在穷究人性及其构成的历史之深渊时,究竟难以在废墟中凭空建立乐园,人文主义的叙述话语提供的可能仅是事后追补的幻相。面对不断被撕裂的历史,人类不断重复自身愚蠢的历史,我们已经很难再去信任通过解释活动达到的所谓最低限度的共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满怀信心之际,对事件的潜能保持警惕,因为它同时有可能成为崩坏的现实。

对观利奥塔与利科的事件之思,我们应理解他们的问题意识实际上都来自对未来政治生活的想象,只不过在后结构主义对意义、共识的反抗中,也许并不存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而这正是古老而强大的人文主义叙事竭力避免之事。透过利奥塔激进的“非人”视角,我们知道艺术见证的非人不仅是亲和的“儿童”形象,伴随着它的是成为非人“怪物”的可能性。而在利科“保守”的人文主义话语中,我们看不到“非人”的尺度,因为非人视角的引入将破坏一切人类意义活动的共同体,在其中所有事件终将归咎于某人的伦理责任,^③并明确我们见证事件的义务。在他们的交锋中,我们同时看到分歧和共识,最终也很难用激进或保守的判断给出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理解他们的各自观点和差异时,我们获得了思考事件性的契机。

(作者刘欣,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副教授。杭州
311121)

责任编辑:项义华

① 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鲁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亚《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顾杭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16页。

② 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③ Paul Ricoeur, *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p. 432.